

金融研究·国内著作

中国金融制度 选择的经济学

张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832.1

25

2007

金融研究·国内著作

中国金融制度 选择的经济学

张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金融制度选择的经济学/张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金融研究·国内著作)

ISBN 978-7-300-07808-3

I. 中…

II. 张…

III. 金融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8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3595 号

金融研究·国内著作

中国金融制度选择的经济学

张 杰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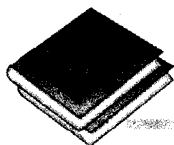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1 000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金融市场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股票市场的发展有目共睹，固定收益市场已经起步，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蓄势待发，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也大大加快。这一切，表明中国金融正在并继续进行着伟大的实践与变革，与此同时，金融研究的发展也日新月异。金融研究的发展为金融实践提供了指导方向，同时金融实践的发展也为金融理论的演进注入强大的活力，两者交相辉映，共同演绎了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变革。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金融实践的推进，我国经济金融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世界金融理论和业务发展提出的重要金融理论问题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新成果、新进展。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改革积极稳健地发展，帮助中国金融界相关人士更好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寻求提升中国金融效率的有效途径，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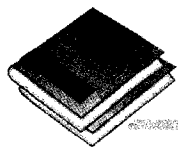


精心策划了这套“金融研究·国内著作”系列图书，旨在把国内金融研究中最新、最好的成果介绍给读者，以期为中国金融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该套图书主要面向经济、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员，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本科高年级及研究生的阅读教材。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图书的推出能如我们所愿，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汇集了笔者近年来观察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点滴心得。虽然各章内容分别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先行发表，但由于是围绕一个主题连续思考，因此将其“搜罗”并“拼接”起来，还是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以“文集”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小册子就具有了学术专著的内涵。

屈指算来，本书已是1998年《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和2003年《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两本著作相继面世之后笔者专门考察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第三部作品了。历时三年写就的一本书，与当下颇为流行的“勾兑”型学术成果相比，已属“陈年佳酿”；但是，若拿“十年磨一剑”这条更为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则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急就章”。不过，聊以为慰的是，如果考虑到以上在不同时期先后面世的三本书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其研究逻辑和内容具有显著的连续性，那么它们就相当于一项整体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或者一本书的三篇。既然如此，即便拿上述最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考量，本书也算勉强“达标”吧。





建立一个能够合理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一般经济学框架是笔者长期的学术追求，虽自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仍决意“上下而求索”。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之完备和精巧已被无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但在运用到解释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时，它们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这种挑战是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起初，让许多人迷惑不解的是，当他们试图拿着被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屡试不爽的标准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现象进行刻画和处理时，竟然一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变量并给出相应的假定条件。对于构建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模型而言，这些变量和假定条件又是如此地不可或缺；可在标准的教科书中，几乎没有针对中国情形的现成解释。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一开始就坚守主流经济学的精巧形式，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进行“一刀切”或者削足适履式的处理；另一条是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和基本理念，重新梳理和解读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内部结构与制度特征，在此基础上，逐步寻找和分辨现代经济学工具的适当切入部位。

相比之下，第一条道路显然具有短期见效的特征。因为在常人看来，处于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金融状况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要尽快理出个“头绪”，就只能利用现代经济学“锋利”的标准工具。果不其然，几刀挥去，竟然“立竿见影”地产生了“快刀斩乱麻”的结果。一时间，大量充塞所谓主流经济学数学符号和曲线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如雪片般飞来，让人目不暇接。本来，这种情形对于处在现代经济学启蒙和“临摹”阶段的中国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此类研究成果的积累和诱导，以及学术界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人们很快产生了一种学术“幻觉”，那就是，这种研究范式将成为“技术装备”尚属落后的中国经济学通往现代经济学圣殿的唯一选择。

事实表明，这种学术“幻觉”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尽管在此种研究范式下并非没有产生好的成果，但毕竟未能成为主流。不少人甚至将经济学研究视作一场简单比拼数理建模手段和计量分析水平的技术竞赛，并据此开始构建了壁垒森严的学术“篱笆”，从而将经济学研究划分为三六九等；中国经济学尚显单薄的研究队伍存在被人为“切割”的隐忧。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因一时无法达到相应的技术要求而成为“等外品”，并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在标准经济学研究文献的行列之外。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家逐步摆脱所谓“苏联范式”的羁绊，开始与现代经济学进行“亲密接触”。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经济学发展的最前沿理论和最新发展动向也与我们处于“零距





离”或“零时差”的状态。尤其是，在所谓“海归派”学者们的影响之下，更为年轻的一代追随者已经把讨论现代经济学的最新数理与计量模型以及最新概念和词汇作为一种时尚。无疑，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所倾注的这种热情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

但让人不无忧虑的是，一种单纯追求数理模型形式之美、动辄对经济现象进行简单计量刻画的倾向从一开始就与这种热情如影相随。我们并不是反对人们使用这些工具，反而认为中国大部分经济学家亟须补上这一课。但我们坚决反对那种为了模型而作模型的风气，因为在这种“作坊”里生产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些在复杂数学符号精心装饰之下不无故弄玄虚和哗众取宠倾向的所谓“标准成果”。仅靠这些东西决不会将中国的经济学带进主流。人们曾经对经济学界只知追求热点和竞相呈递“折子”的短期行为颇有微辞，认为这些行为应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浮躁心态负责。实际上，前面提及的那种风气说到底也体现了心态的躁动，只不过这种躁动被十分巧妙地掩藏于看似沉静的复杂推导过程之中。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耐人寻味。我们暂且抛开更早期先辈们的惨淡努力和曲折经历，从总体上讲，改革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经济学人开始蹒跚学步。他们从国内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各类译丛，特别是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中学习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从日渐熟悉的海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论著中吸取经济学论文的标准“间架结构”和“擒拿”技法。这一过程进行的并不轻松和顺利。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从总体上并未走出“临摹”阶段，独立行走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尚待时日。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中文版首次在国人面前亮相。可以肯定地说，这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刺激不小。这些年度报告的结构、逻辑与行文，以及参考文献、附录等等，给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另一种崭新、简洁而务实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从此，《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还有别的范本）便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经济学论文范本，可以说，如今国内许多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就是从当年的这种模仿中开始经济学“创作”的。客观地说，对这种模仿的功效不可低估，正是基于此，我们大部分经济学论文作者才逐步走出原有的“八股”范式，开始理解经济学分析过程的真实含义和美感。

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模仿”之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终于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共识，更有分歧。共识在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和范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最终要融入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长河，不可能“另起炉灶”





或另搞一套。分歧在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仅仅意味着给我们的经济学人配备现代经济学精良的“技术装备”？实际上，这种倾向已经开始蔓延为一种风气。这是改革以来我们早期“模仿”现代经济学的一种后遗症。不少人以为只要“照猫画虎”就可以把猫变成虎，抑或给一匹白马身上画上黑色“条纹”，就会得到一匹真正的斑马。现代经济学范式如同一种“制度”，有可模仿者，也有不可模仿者。可模仿者为经济学分析“技术”，不可模仿者为经济学思想。长期以来，我们许多经济学人人为自己简陋而落后的经济学分析技术而自卑，因此，对这种技术产生“拜物教”心理，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煞有介事地误将习练经济学技术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全部”，则会产生十分危险的误导效应，特别是在人们仍然渴求经济学“技术进步”的阶段。

不难预料，以上分歧仍会长期存在，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分歧的存在以及允许分歧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共识终将产生于分歧。不过，随着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技术人群的迅速扩展，人们之间有关经济学技术的竞争将趋于均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会逐渐失去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经济学技术便可获取“超额学术利润”的情形将不复存在。那时，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市场结构”与绩效考量也将为之一变。一旦人们都不得不通过经济学的思想竞争获取丰厚的“学术回报”，则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才算真正走出蹒跚学步的“孩提时代”，走上独立前行的成长之路。

曾几何时，国人开始期盼自己的经济学家有朝一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有人开始预测可能获奖的领域与人选。若静下心来暗自揣度，中国的经济学家凭什么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靠那几篇“折子”，还是靠那些“照猫画虎”的公式，抑或靠那些凭借人造数据验证了的苍白结论？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目前正在经历着的跌宕起伏的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突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很好地把握它。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坚定地走上充满挑战的第二条道路。从现在开始，大凡富有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精神的中国经济学家注定要一头扎进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实践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探寻，以便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寻求真正的理论源泉并锻造坚实的思想支柱。这种长期探寻无疑会进一步考验中国几代经济学家的耐心、毅力和智慧。我们不能奢望一夜之间就能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笔下产生什么被经济学界公认的命题和定理，但是，只要他们秉持的是端端正正的学术态度，运用的是规规矩矩的分析方法，研究的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那些当下乍





看稚嫩甚至有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和假说就一定会产生“集腋成裘”效应，最终积淀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贵基础。

这部著作就权当是笔者为这个“可贵基础”所贡献的一粒细沙。睿智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尽管全书前后的理论逻辑基本上保持一致，但各章之间的写作风格却参差不齐。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实际上凸显出笔者面对中国经济学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困局和徘徊心境，其中既显露着某种迎合，也掩藏着一些挣扎，还掺杂着些许无奈。好在这种徘徊心境迄今并未动摇笔者通过刻画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探寻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的信心。笔者坚信，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有了哪怕一丁点儿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或者说好不容易发出几只理论“嫩芽”，那一定是在此前某个学术“播种”的季节，一些执著而务实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这块被改革与发展之犁反复深翻着的热土上撒下了几粒理论“种子”。可以预见，既然种子已经发芽，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还会远吗？！

本书除第4章外，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分别发表于《经济研究》和《金融研究》这两种国内权威的学术期刊中。从总体上讲，在与既有研究取得总体逻辑一致的前提下，笔者试图基于制度选择视角对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和变迁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以求丰富和扩展已有的研究框架和结论。本书的分析结构大致为，首先关注一国金融制度特别是银行制度的决定因素，进而在宏观层面分析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与银行制度的内在联系；接着从微观角度剖析向国有银行注资的金融政治经济学涵义以及国有银行制度存在的理由，并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提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化悖论；随后立足长期视角讨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过程、绩效和演进，以求弥补原有研究框架忽略农村金融因素的不足。与以往的研究一样，本书仍然主要依托国有银行制度展开讨论，其基本原因在于，有关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所涉利益各方的效用偏好和绩效估价，从而直接决定着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完全可以这样说，如若撇开对国有银行制度演进的深入观察，我们几乎不可能对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问题“说三道四”，就更不用说进行系统分析了。

第1章“究竟是什么决定一国银行制度的选择？——重新解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含义”，删节稿发表于《金融研究》2005年第9期卷首。这一章的写作动因应做详细交代。在改革以来的多数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家和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大都信奉和推行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和政策。这一理念和政策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那就是“市场至上”；衡量银行改革取得进展的唯一标志是由市场规则配置的金融资源份额是否有所增加。由于这





一改革理念从一开始就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置于“此消彼涨”的对立地位，因此，政府退出金融资源配置过程就成为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乍一看，这种逻辑有其合理性，因为若拿国际上通行的银行经营绩效标准来衡量中国银行业，无论是相对指标（如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还是风险管理和信贷行为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甚至十分糟糕；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恰好受到政府因素的控制。

不过，问题在于，若征之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实际进程，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并未在增进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的经营绩效方面有明显“斩获”。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简单的市场化或者政府退出能否将中国的金融体系带入稳健且有效率的境界。如此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分辨政府因素的性质与经济作用。实际上，相对于有关市场和微观经济机理的认识，现代经济学在解释政府因素方面的努力并不理想，抑或难言成功，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们就中国金融改革路径动辄贸然得出某些偏颇结论的根本原因。显然，重要的是重新认识政府因素以及政府因素与市场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为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制度改革道路选择寻找到合理的理论基础。

对于政府因素，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做法是对其进行外生处理，既然是外生因素，就无法成为市场的构成要素。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的完整性是独立于政府因素的，因此，后者的正向效应只有在前者出现问题（即市场失灵）时才得以显现；而在一般情况下，政府的出现只会伤害市场。后来，基于某些国家或者地区（如东亚）的某些时期政府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一些被主流经济学家划为“另类”的学者（如斯蒂格利茨等）力图重构政府因素与市场的关系，以改变人们对政府作用的传统看法或偏见；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努力并未明显改变其与主流经济学在此问题上的力量对比。更何况，这种努力只是为了强调曾被长期低估和冷落的政府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并提醒人们，有时政府因素对于市场并无恶意。这一章的意图则不打算将政府因素的作用继续停留在所谓是否“低估”或者是否具有“恶意”的层次，而试图对其进行“内生性”处理，从而初步修复主流经济学对一国金融制度选择问题的解释能力。

平心而论，笔者的这种努力与其说是理论尝试，毋宁说是学术冒险。更有甚者，由于可能触碰到主流经济学长期坚守的基本原理乃至核心理念，而这种理念在中国学术界又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不少人已将其奉为“放之四海”而“颠覆不破”的绝对真理，因此这种努力就很容易被斥为浅薄甚至无知。不过，若换一个角度看，不积浅薄，何成深厚之基础；不涉无知，





怎达智慧之彼岸。若惧怕被冠以“无知”之名而墨守成规，这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来说恐怕是最致命的一击。实际上，为探寻前人尚未明示或者未能触及的领域而被视为莽撞和无知几乎成为学术发展史的常态。这一章能够最终成稿并公开发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上述信念的支撑和鼓舞，而这种信念也无疑渗透于本书其余各章的字里行间，成为笔者近年来矢志坚持探索中国金融制度选择问题的精神动力。

简单地说，这一章之所以将政府因素做“内生性”处理，旨在表明政府因素与私人因素一样，也是市场的构成要素；不同的制度环境固然可以决定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权重，并由此刻画出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如英美和东亚），但不能先验地规定只有私人因素占优的经济才是标准的市场经济“模板”，而政府因素权重较大的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而且，这两类市场经济并无先天的优劣之分，因为它们都有过成功的经济增长经历，当然也都遭遇过经济金融运行失败的重创。这一判断是如此重要，它使我们得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偏好，或者至少丰富和拓宽了我们思考中国金融制度选择问题的“维度”与空间。由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会对银行制度提出各异的需求，因此，与以私人主导型市场经济为依托的银行制度“单调”接轨就不一定是好的和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这样做并不必然带来银行体系整体效率的改进，有时还可能适得其反。

第2章“银行制度与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删节稿以《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在理论史上，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进程曾经是一些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麦金农（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这两部先驱性著作相继问世以来，由于寻找到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经验实证基础，一时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便在学术界逐渐盛行。从此，货币化水平（后来有人将其进一步扩展为金融化水平）逐步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货币化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个中缘由大致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在较低的水平上起步（世界银行的保守估计为0.25），并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以较快的速度向上攀升，但在1997年之前，货币化指数并未达到日本曾经达到的高度。至少在理论上，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没有超出戈德史密斯所划定的路径。不少人猜测，中国货币化水平的上升势头固然强劲，但断无可能突破由日本这个东亚经济奇迹的首创者所创造并长期保持的





1.22 的货币化“世界记录”。

殊不知，这个记录不仅很快被打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曾经一度直逼 2.0 的理论关口。中国货币化水平自 1993 年突破 1.0 的门槛，十余年间一路“高歌猛进”，“夺关陷隘”，终于撩拨起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兴趣。学术探寻的“帷幔”一旦撩开，大大小小的问题便如预想的那样接踵而至。早先有人断言，货币化水平是一把衡量经济发展和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标尺，那么，如今中国的货币化水平已经跃居全球之巅，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就可与世界经济强国比肩而立了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可货币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国落差”进一步牵住了人们的思维。于是乎，另外一类学术判断浮出水面，认为一国的货币化指数并非越高越好，因为这种高货币化的情形一方面凸显出实质经济部门对于银行部门的过分依赖以及金融市场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反映着经济金融运行过程的某些严重扭曲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金融风险的积累。

在经历了有关货币化水平孰高孰低的是非争辩和价值评判之后，人们的“眼球”最终被两个层面的问题所吸引，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中国货币化指数的未来走势，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导致和支撑中国高货币化水平的原因和因素。有关第一个层面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更多地凸显着不同学者围绕计量经济模型以及数据处理的“技术竞争”，结论各异是意料之中，有些研究成果甚至将中国货币化指数的上限确定为接近 3.5 的高位。乍一看，这些数值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乃至难以置信，可是，在对中国的高货币化问题本身提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之前，我们显然无法贸然对这些数值的真伪进行甄别。

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上。一开始，一些学者合乎逻辑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经济改革以来迅速增长的货币需求，以及在低货币化水平基础上起步的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对广义货币供给量的超常牵引机制等宏观因素。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这些学者及其相关文献的学术贡献，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文献远未触及中国高货币化的深层形成机理，因此无法满足人们积蓄已久的学术期待。本章虽不敢说一定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期待，但至少可以将已有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小步。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本章初步发现了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银行体系以及居民部门基于内部货币扩张而形成的利益关联机制，这种利益关联机制的存在给中国的高货币化进程赋予了十分特殊的金融制度内涵。进一步地，这一发现也为此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某种微观经济视角，而这种视角恰好是我们以往的相关研究所缺乏的。

第 3 章“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删节稿





发表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卷首，并作为当年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而被收录于《中国经济学——2004》（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一章的初稿撰写于2003年岁末，对于中国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而言，那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时刻。就在2003年年末，以新一轮政府注资和推动“上市”为标志，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踏上了新的改革征程。一开始，人们对此次改革普遍寄予厚望，这自然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尽管成败难料，有所行动总比固守“僵局”带给人们更多的期待和想象。实际上，这样的改革尝试以及对人们心理预期的“撩拨”在以往的改革历程中并不鲜见。但是，让笔者逐渐感到不安的是，上述期待在理论界很快凝结成对此次改革绩效的盲目乐观情绪，并且形成“一边倒”的势头；而政策层和决策层也明显受到这种情绪和势头的“鼓舞”，于是乎，原本相对“保守”和渐进的改革设计便逐步转变为乐观而“激进”的改革操作。就这样，一种针对国有银行更为大胆和前所未有的改革计划被迅速“敲定”。在中国特有的政府主导型的改革逻辑之下，一项改革计划一旦被制定出来，便会通过“自上而下”的特有路径安排而得到迅速有力地贯彻与落实。

最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以注资促进国有银行改革的政策“企图”。国家在1997年首次给国有银行注资以来，一种通过单方面修补资本结构从而改变国有银行行为及其绩效的改革思路逐步清晰起来，而2003年年末再一次更大规模的注资正是这种改革思路的延续。相比之下，上一次注资的政策意图是回应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脆弱的银行体系的“风险提示”，而此次注资则新增了另一个更为紧迫而重要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为快速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中国国有银行业塑造合乎国际标准的“面目”。时间是如此紧迫，而国有银行体制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责任又是那样“沉重”，这就意味着“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显然并不现实，能够快速见效的改革方式只有着眼于改变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

问题就出在这里。要将国有银行体系改造成何种面目，其实著名的《巴塞尔协议》早有明确刻画。既然国际通行的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度权并不在自己手里，那么，渴望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也就只能在既定的框架约束下进行。若用这些国际规则考量，国有银行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不合格。资本充足率偏低，不良贷款率过高，银行行为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十分严重等等，不一而足。基于此，为了使中国的国有银行尽早跻身国际标准的大银行之列，同时也为银行业市场完全开放之后国内银行更好地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国家对国有银行空前规模的“修补”行动注定要进行。





巨额成本的付出已成必然，进一步的问题是改革回报能有几何？可以说，笔者的这一“发问”在本章写作的当时只隐含着某种程度的担忧，当然有人认为这纯属“杞人忧天”，但在国有银行从注资到“上市”改革已经“顺利”推进的今天，这种担忧不但没有得到缓解，而且比以往更加深重了。担忧之所以加重，一方面的理由是，除了资本结构的变化，意在与国际接轨的既有改革并没有明显改善国有银行体系的整体绩效，特别是资产结构的表现。而根据某些研究文献的分析结论，改革后的国有银行行为较之以前并无二致，甚至有时还不如从前。另一方面的理由则在这一章中得到充分表达。毋庸置疑，着眼于简单修补和改变资本结构的改革行动注定要步入一条制度模仿和移植的轨道，而这种改革方式得以成功的条件又相当苛刻，那就是资本结构的改变会迅速扭转国有银行的金融行为，使其更多地按照市场规则行事，能够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进而影响其信贷选择机制和资产结构。与此同时，一个适宜的市场环境也应当先期形成。在不少人看来，上述条件和逻辑会“水到渠成”，而实际上，现实情形则与此相去甚远。

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简单事实是，长期以来，改革中的国有银行体系一直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具体体现为这一体系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支持经济增长的义务。这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改革所面对的基本“国情”，它实际上已经“锁定”了国有银行的资产结构。换言之，这种情形表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对国有银行制度存在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当这种需求没有发生显著衰减时，任何旨在单方面改变国有银行资本结构的改革行动注定会无功而返。饶有意味的是，在此过程中，一种时隐时现、挥之不去的改革“幻觉”总是徘徊在人们眼前：从资本结构看，已经成功“上市”的国有银行离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是如此之近；从资产结构看，这些国有银行离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又是如此之远。

由此进一步证明笔者长期以来坚守的一个理念的合理性，那就是“好”的制度并不等于“有用”的制度，“好”的和“有用”的制度并不稀缺，但“好而有用”的制度则是稀缺的。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要让“好”的银行制度（如欧美的商业银行制度）变成“有用”的银行制度，最为关键之处是市场条件的提供。仅从理论上讲，我们固然可以从西方世界直接复制那些“好”的银行制度，但要让这些“好”的银行制度在“异国他乡”继续“存活”，则需要相应的市场条件。后者显然无法从外部同步“移植”，它只能由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运行本身孕育和“内生”。无疑地，本章所关注的政府注资（包括后来的“上市”）只能暂时解决前者（复制“好”的银行制度），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搞定”后者（提供适宜的市场条件）。这就是问题





所在。

第4章“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悖论’：基于海南案例的分析”，是本书中唯一没有公开发表的部分，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笔者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最新看法。这部分内容虽然成稿较晚，但最初的想法却源自7年前针对中国金融改革“海南现象”的一次小范围讨论。那次讨论的参加者中就有本章案例的部分“当事人”，由于是整个事情的亲历者，因此他们的叙述真实而生动。随后，我的一个博士生根据讨论情况整理出一个粗略的文稿，便是本章的雏形。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本章在撰写过程中一直未能得到案例所涉企业更为详尽的第一手材料及其相关数据，因此文中的相关数据和情节存在进一步核实的可能性。如果哪位读者发现本章数据和情节的任何失实和不妥之处，望能随时告知笔者，以便及时更正。

不过，不曾料想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的“扰动”，这一章进一步的撰写计划在此次讨论结束之后不久便戛然而止，那份“文稿”也被随意丢进书房角落的废旧文件堆中。所幸的是，虽然经历数次搬家的“颠沛流离”，它依然“无怨无悔”地跟随左右。当近年来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新动向再一次强烈刺激着笔者的思维神经时，那份尘封多年的文稿便重新浮现于我的记忆深处。几乎翻遍书柜的每一个角落，在“劫后余生”的陈年文件中，那份文稿最终露出“倩影”：纸张虽已发黄，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如今看来，那份文稿的重要性在于初步揭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困局”，这种困局主要体现为国家面对国有金融体系改革时所表现出来的在金融控制和市场化取向两者之间进行的两难选择。人们可以通过本章所描述的“海南案例”（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领略那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惊心动魄的金融改革实验，其过程之跌宕以及后果之沉重都无疑使人印象深刻，而国家对于改革实验结局的政策“无奈”也令人扼腕长叹。但更重要的是，如今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国有银行改革，作为主要推动者的国家，其政策意图仍然没有超越兼顾金融控制和金融市场化“双重目标”的原有框架。因此，深陷“市场化困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次国有银行改革的内部博弈格局以及外部条件与当年的“海南案例”稍有不同。“海南案例”体现的是国内“市场化”金融企业、国有银行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格局，而目前以“上市”为主线的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则凸显出国有银行代理人、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就后者而言，改革的成败实际上取决于国家是否能够及时甄别并有效控制其他两个“当事人”意在向“绝对控股人”转移风险的利益合谋，与此同时，还能避免相关治理举措对其激励机制的损害。显然，这是





一场“如履薄冰”式的改革游戏，要求参与游戏的每一方都万般小心，如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满盘皆输的结局。

第5章“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删节稿发表于《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卷首。这一章的最初想法萌发于2003年初，随后携尚未成形的研究提纲，应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之邀主讲其著名的“双周讨论会”第243期，当时的演讲题目为“解读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两位评论人马晓河研究员和宋宏远研究员的点评十分中肯，与会其他学者茅于軾教授、张曙光教授、盛洪教授等的意见也直截了当和褒贬分明，特别是盛洪教授对一些重要历史证据的纠正使我至今记忆深刻。随后，笔者基于这次演讲录音的整理稿对原有思路和逻辑框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扩展。有意思的是，就在前述演讲稿的整理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由我主笔的一部专著《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准备付梓。出于整体结构与逻辑的考虑，需要在前面加上“引论”，以便对相关背景和问题有所交代，而且这种交代应当富有历史纵深感并彰显长期视角。由于出版日程安排很紧，因此演讲文稿的整理只好暂时让位于“引论”的写作。原本想在演讲稿的框架之外寻找撰写“引论”的逻辑，但我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这种想法。原因十分简单，演讲文稿的内容和篇幅虽然单薄，但其视角与逻辑则已“定型”。因此，撰写“引论”的唯一出发点就是那篇尚属“半成品”的演讲文稿，断无另起炉灶的可能。就这样，“引论”的写作实际上就成为演讲文稿的另一种扩展。最后，“引论”先期完成并很快付印，演讲文稿的整理和发表反而拖后。后来以《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为题发表于《金融研究》2005年第2期的论文便是这篇“引论”的删改稿。

不用讳言，我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的研究实属偶然，它缘起于2003年初一个“意外”中标的教育部农村金融研究项目。虽然这个项目迄今仍未结项，但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是积累了一些。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和出版便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金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够，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只要你敢发表片言只语，就极有可能马上成为“专家”。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性。在本章看来，要深刻理解中国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的重要性，需要立足于一个长期的历史视角。一旦从这个视角看过去，中国农村的金融困境就不再是农户的信贷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以及究竟何种金融机构才能满足这种信贷需求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金融困境实际上缠绕和凝结着农村社会长期积淀的社会经济矛盾，中国农村的金融制度选择牵扯着在新的经济社

